（上接11版）

特征。因此对于文学史研究者也含有如何立足于当代观照历史的课题，当下的问题意识给历史注入活力，同时历史研究不仅是一种专业工作，也是一种参与当下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实践活动。因此文学史研究者更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学者，只有打通古今才能对中国文学史有个整体的认识，为创造新文化做出贡献。上引这段话如果从诠释学角度来理解也富于潜力，所谓“我们之作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既必须与当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相适应”，似乎与我们习知的克罗齐式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相通，而章先生又说“又应不与以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背道而驰”，意谓历史需要合乎历史真实，须做艰苦的探索，须遵循实证方法与学术规范。

谈到艺术形式，章先生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绿”字为例：“如果没有从唐代杜甫开始明显起来的、经贾岛等努力推进的诗歌注重炼字的传统，王安石就不会对此字反复推敲；而王安石这种创造性劳动又为后来的诗人炼字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考察文学形式演进时，应着眼于由无数作家的贡献所组成的文学技巧的不断丰富和提高。”（《不京不海集》，页574）这里从“炼字”的修辞方法的历史演变来考察“绿”字的创意价值，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其他文学形式范畴的分析，如今天常用于小说、电影分析的类型研究。学者须对文学文本及形式传统了如指掌才能做到这样的细节考察，因此古今演变的研究对学者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另外须注意的是“传统”一词，意谓形式创造的历史累积，要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必须以熟悉前人创造成果为前提。这与艾略特所谓诗人须自置于经典传统之中推陈出新的说法异曲同工，而王安石的“绿”字凝聚着“影响的焦虑”，因此对于今天的艺术创造，章先生的解释也足资启发。

由“古今演变”的“古”“今”构成传统与现代互动的时空场域，并非僵化的概念。从古今两端思考问题将激发新的探索热情、新的思想火花。古今演变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本身是开创性的，有待探索，却启迪了无限的可能性，正如章先生所举的巴金的《家》与《红楼梦》的联系，也是一番探索而发现的例证。对于现代文学这一头，他在《开端》一文中把20世纪初定为现代文学的开端，虽然这一提法已在学者当中流传，但先生另有问题意识：一面重申“五四”的“人性的解放”的精神、白话文与艺术创造的划时代意义，一面把“五四”回到历史真实，打破概念的迷思而开拓鲜活多元的思想空间。对鲁迅早期《摩罗诗力说》、梁启超和徐枕亚《玉梨魂》的解读，皆以“人性”历史演变的观点一以贯之，令人对于20世纪初至“五四”之前的文学形态刮目相看，尤其对一向被“五四”所反对被文学史所否定的《玉梨魂》的肯定不啻为重估“鸳鸯蝴蝶派”开启了闸门。同样如上面提到《新著》中近世文学“嬗变期”的论述也具有探索历史盲点与祛魅“五四”的意味，如对《海上花列传》的“高度艺术成就”的评价，在较早2002年发表的《写实主义成分在明清小说中的增长》一文中已有论及：“《海上花列传》虽不足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并驾齐驱，但其描写‘平淡而自然’，故尚不致与它们背道而驰。到了清末的所谓四大‘谴责小说’，却走了回头路。”（《不京不海集》，页541）这里“平淡而自然”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海上花列传》语言风格的批评，但章先生以四五页篇幅论述其文学成就，另一方面鲁迅把四大“谴责小说”看做晚清小说成就的代表，因此章先生说“走了回头路”，意谓走上了“载道言志”的老路，也是对鲁迅观点的某种修正。

从古今演变来观察近十几年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热点或趋势，不仅可看到章先生的“整体”观念仍具充沛活力，且开启多元的探索空间。

在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通俗文学”研究论述中，《海上花列传》被尊为现代城市文学的源起，《玉梨魂》则是“鸳鸯蝴蝶派”的鼻祖，在此语境里来看章先生关于这两部小说的高度评价，无疑为“通俗文学”的正名及其研究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对于范伯群先生提出“通俗”与“五四”的“双翼”说，学者们似不反对，由是也形成了“雅”“俗”分治的格局。特别在作品的艺术性与经典性问题上，治“五四”者不乏居高临下者，治“通俗”的则不乏自视为软肋者，这些倾向对于文学“整体”的认识都是不利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学习章先生对这两部小说的论述，破除雅俗的思维局限，以人性表现与艺术形式的互动关系为准则，方能有助于“大文学史”的书写。

近年来王德威先生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得到学界关注，也出现不少研究成果。自“重写文学史”以来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莫过于“现代性”议题，大约觉察到其局限，于是呼吁抒情传统，含某种回归传统的意味，不过迄今为止对抒情传统的研究大多是理论阐述或着眼于现代文学或文化中的抒情表现。从抒情传统的角度来看《新著》，始终贯穿着“尚情崇美”的主流，强调文学的基本特征即为情感的表现，可说是一部抒情文学史昭昭在目，且透过人性的复杂棱镜呈现出抒情传统的丰富色谱。如论及明代中期祝允明时指出：“他对写作艳体诗的热衷”，并对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祝允明书艳体诗册》作解读，认为在数量上超过韩渥和杨维祯，“在诗歌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这意味着通过歌咏男女爱情来冲击礼教和儒家诗学观念的努力，在明代中期已经重新开始，并且已有明显的表现”（下卷，页83）。在一向受到儒家正统排斥的历史脉络中认为“艳体诗”属于个体私情的人性深刻的表现，几乎视之为一个抒情次传统，同样也见诸对晚明王彦泓的高度评价，并指出从20世纪初至抗战时期郁达夫、王独清、唐弢等都受到影响，还传到日本被称为中国的波特莱尔。这个现代链接是个重要提示。20世纪初王彦泓的作品被重新发现而被称为“香艳体”，尤其在民国初年不仅其作品被广为传播与模仿，在“男女平权”思潮的影响下，如王文濡主编的《香艳杂志》、周瘦鹃的《香艳丛话》等大力发掘表彰古今女性作家的“艳情诗”。其实章先生对这方面一向关注，如《新著》论及明代中期杨慎之妻黄娥的散曲时指出肯定了“女性对自己的权利的要求”，即为一例（下卷，页155）。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玉台新詠〉为张丽华“撰录”考》一文不啻在追溯女性“艳体诗”的历史渊源了。

《开端》与《新著》对近世文学嬗变期至20世纪初的文学的考察释放出新的空间，对于目前流行的“清末民初”研究也扮演了启其先机的角色。继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之后，韩南先生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和胡志德先生的《把世界带回家：清末民初中国对西方的挪用》（*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两书分别于2004、2005年出版，颇具标志性，海外大咖们聚焦于这一时段决非偶然。正如章先生所揭示的，从王国维、鲁迅、梁启超到韩邦庆、徐枕亚，在国族危机之际求新求变，无论思想、感情、语言等方面空前呈现古今中外之间的冲突、调适与融合的复杂性，对于历史演变的反思启迪了多元思考的可能性。最近陈广宏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一书对清末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作了系统考察，即以“整体”观照及运用宏观与微观方法的出色成果。如书中专章讨论黄人的“审美为目的”的文学史观念，是清末文学演变中的重要一环。又如对胡适的“纯文学史”与郑振铎的“俗文学史”作了精彩论述，也带来进一步思考：“五四”的文学史建构可说是把雅俗两界占尽风光，当然“旧派”文学就无处容身了。

近年来文学与文化的跨界研究方兴未艾，《新著》的《增订本序》说：

对于不少学者指出“光从文学来研究文学是不够的，必须从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来研究文学”。我们的看法是：从文化的总体来研究文学确实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对于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文学在内——的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哪有对于文化总体的多少接近于正确的认识，又如何能从文化的总体来研究文学？……所以从文化的总体发展来研究文学和着重于（并不是“光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都是需要的，二者可以——而且必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以致彼此纠正。本书属于后一种工作的性质。

对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势头，章先生敏感地作了回应，谨慎而具开放性，并且提出了如何立足文学而从事其与文化之间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带有方向性的启示。

章先生的文学整体观念离不开他的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对材料的收集和考证一丝不苟，却全局在胸，崇尚真知灼见，许多观点是经过长期酝酿反复验证而产生的，因此我们亟须对先生的著述、对他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展开研究，同时须保持他勇于探索不断开拓的精神，有所发现和创造，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本文根据2017年12月4日作者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举办的“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系列讲座上的演讲整理。）

## 《艺术新闻》年度不完全书单

**《反博物馆》**（Mathieu Copeland和Balthazar Lovay编的批评集，Fri Art and König Books）

**《小便数据，1280—2014》**（Pissing Figures，Jean－Claude Lebensztejn著，一部讨论小解的艺术史著作，David Zwirner Books）

**《免税艺术：星球内战时代的艺术》**（Hito Steyerl著，提出在这个日益不平等的时代我们可以如何欣赏甚至制作艺术，Verso）

**《LOT-EK：对象与运营》**（Thomas de Monchaux对Ada Tolla和Giuseppe Lignano这一建筑师组合的访谈与文章，Monacelli Press）

**《咱们浴室见：重生与摇滚乐在纽约，2001—2011》**（Meet Me in the Bathroom，Lizzie Goodman著，讲述画廊、俱乐部、艺术家工作室如何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缓慢迁移，DeyStreet）

**《奇卡纳/诺的混音：1960年代以来的艺术与勘误》**（Karen Mary Davalos著，对一群跨界的拉丁艺术家的讨论，纽约大学出版社）